

工人文化宫怎么沉寂了

岳 威 要维维

2003年,山西省还有18个地市级工人文化宫,52个区县级工人文化宫,但如今只剩下不到六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给企业职工提供更好的服务,工人文化宫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兴起。工人文化宫是职工文化活动的阵地,是职工的学校和乐园,为职工群众服务是其宗旨。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在山西省,不少当年知名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有的被拆迁,有的被占用,风光不再。

一个工人俱乐部的“沉沦”

10月20日上午,北大街解放路十字路口附近。近在咫尺,但笔者向多位路人打探,才找到了当年赫赫有名的太原工人俱乐部。指着眼前的三层大楼,头发花白的李大爷说:“就是这个楼,现在全成了商业出租地,电影院也拆了,一楼都是商铺,二楼成了一个公司。不信你进去看看。俱乐部的办公点在旁边的小院里。”

顺着李大爷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了三层建筑旁的一个通道,通道口挂着“太原工人俱乐部”的牌匾。在通道尽头的院子里,幼儿园、洗车行、美容美发厅等各式色彩鲜艳的招牌出现在眼前。在院子东南角落里,我们敲开了一间挂有办公室字样牌子的平房,这就是目前太原工人俱乐部的办公场所。这里的工作人员讲述了工人俱乐部的辉煌和衰落。“俱乐部是1958年建设的,有7150平方米,当时的名字是:建筑工人俱乐部。因为是行业工人俱乐部,全市的建筑工人听到消息都义务来建设,三层的主体结构十来天就起来了,整个建筑工期也就用了个来月的时间。”工作人员回忆说,当时俱乐部一带都是小平房,三层近20米的建筑,在当时是城北最高、最漂亮的标志性建筑,不少人慕名前来参观、娱乐。

建成后的太原工人俱乐部能看电影,有舞厅、可以打台球、看录像,一度成为太原市民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当时可火爆了,



大同市工人文化宫活动中心

一天的人流量能达到一两万人。”工作人员说,由于当时群众文化活动的场地较少,市内仅有的几个场所成了香饽饽。遇到流行的影片,想要早点看都得托关系、走后门。

1995年,随着设备老化,录像、台球等传统娱乐方式逐渐被市场淘汰,加之政府对俱乐部的市场淘汰,加之政府对俱乐部的投入不足,太原工人俱乐部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俱乐部一样,开始通过出租场地来维持生计。

四成以上文化宫消亡

“不仅是太原工人俱乐部面临这样的窘境,山西省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都面临同样的境地。”山西省总工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山西省共有10个市级工人文化宫、24个县级工人文化宫。而在2003年统计时,山西省还有18个地市级工人文化宫,52个区县级工人文化宫,“40%以上的市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和50%以上的县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已经消亡。”而留存下来的文化宫俱乐部情况也不乐观,普遍靠出租场地维生。“最落魄时甚至连职工的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更让人揪心的是,不少城市改造扩建,很多工人文化宫被拆迁或占用,至今仍未给予补偿和重建。”山西省总工会工作人员说。

同时,由于面临巨大的生存

压力,一些工人文化宫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了服务宗旨,忽视了公益性质。该工作人员坦言,“文化宫里没工人”“文化宫里没文化”。一些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因长期得不到相应的投入,运作经费不足,政策落实到位,无法正常运行,致使活动阵地没活动,一些文化宫俱乐部完全抛弃了自身功能,凭着牌子等靠要,甚至成了一些关系户就业的跳板。

工人文化宫的沉寂源于何处?这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工人文化宫本身的“两难身份”有关。山西省总工会相关工作人员说,一方面文化宫受到了经济体制改革、企业发展和多元化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工人文化宫原本是总工会财政全额拨款,但是后来体制逐渐改成了差额拨款,再后来就成了自行收支,自负盈亏。为了生存,一些工人文化宫不得不开始

出租场地和举办培训班。

“现在工人文化宫经费紧张,但是事业单位的性质又决定工人文化宫不可能完全市场化,这种身份让文化宫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无法活跃起来。”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没有明确政策,文化宫很难在解决职工温饱 and 体现公益团体社会力量之间找到平衡点。

“大同模式”公益性占六成

曾经红火一时的工人文化宫,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回归主流文化阵地,重建昔日辉煌?山西省总工会相关人士分析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和自身管理思路的转变。“工人文化宫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光靠出租场地、搞培训是没有出路的。今后一要靠自己动脑筋创效益,二要依靠政府的扶持,才能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公益性的职工文化活动中。”

在这方面,大同市工人文化宫走在了山西省的前列。大同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同样经历上世纪90年代初惨淡的岁月后,大同市工人文化宫率先丢掉“等靠要”的思想包袱,树立“看电影到文化宫”的品牌,包括主任在内的所有职工走上街头,开始尝试市场推广和品牌重塑。“硬件建设是一方面,市场认可是一方面。”该负责人表示,在文化活动中日益市场化,职工兴趣更加多元化,文化现象不断复杂化的历史条件下,工人文化宫要发出工会的声音,同样需要市场的手

段。“现在各家文艺场所都在公开的平台竞争,为了吸引职工、吸引顾客,我们也做广告、做推广。”

目前自收自支的大同市工人文化宫有电影放映、少儿培训两个主营项目,去年实现经营收入达317万元。这些收入保证了文化宫的正常运转,同时也为公益活动提供了必要的保证。该负责人表示:“有了这些经费,我们每天聘请专业教师免费为职工群众领操,组建了老年合唱团、职工艺术团等10余个团体,职工参加培训全部免费。”

这种被称为“大同模式”的文化宫发展路径按照市场化企业运作,公益性服务项目和收费有偿服务项目分开,前者维持文化宫的公益服务性质,后者维持文化宫的生存。但也有不少人提出质疑:文化宫毕竟是事业单位,过多的市场行为是否妥当?如果公益活动与市场行为冲突,是否会出现见利忘本的情况?

对此,山西省总工会明确表示,工人文化宫坚持公益性事业单位主体不变。同时为了解决公益性主业和经营性部门相互交叉、混乱管理的状况,山西省总工会提出“六四比例”,即公益性文化事业比重不得低于60%。

一位基层工会干部总结道,“大同模式”使得传统的文化功能没丧失,公益性服务没放弃,市场化的运作稳步进行。他希望这种模式能让更多的基层文化宫“凤凰涅槃”,早日回归主流文化阵地。



沃尔沃莫斯科时装周于10月20日至25日在莫斯科商旅展览中心举行。图为模特在沃尔沃莫斯科时装周上展示俄罗斯品牌服装。(新华社发)

今年以来,盛大文学接收购潇湘书院、天方听书网、悦读网等国内几大知名网络文学网站,成为数字阅读时代一家独大的“巨无霸”。盛大文学更是高调宣称:光用于采购传统图书的电子版权的费用就得花2000万元,包括韩寒、于丹、郭敬明的作品和《狼图腾》系列等几乎所有的畅销书。

然而,北京读者图书有限公司在日前出版《藏地密码9》时爆出的一条消息引起各方关注:《藏地密码》被数字出版以来的两年收入竟然为零。近期,中华书局又为维护《二十四史》的数字版权在全国范围发起13桩诉讼。与此同时,畅销书作家饶雪漫表示,自己签的数字版权合同,至今只拿到几千元,而另一排名富豪榜的作家慕容雪村表示自己不曾拿到一分钱的数字版权。有业内人士统计,作家富豪榜排名前10位的作家,在数字版权方面的收入之和不到20万元。

《藏地密码》数字出版收入为零

两年前,《藏地密码》刚出版时,为确保小说畅销,读者图书将《藏地密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家授权给某门户网站读书频道,该读书频道将《藏地密码》放在网页上,做收费阅读。随着数字出版渠道拓展,《藏地密码》以收费阅读形式出现在了手机阅读基地、苹果手机收费软件商店等热门数字出版渠道上。

但读者图书发现,该读书频道提供的《藏地密码》1到7在手机阅读基地上的最新数据表明,《藏地密码》1到7的销售金额不足5000元,且结算遥遥无期。而苹果手机收费软件商店上共有9个版本的《藏地密码》在付费下载,但9个版本全都是盗版。日前,手机运营商针对《藏地密码8》的推荐短信也已发出,费用包月3元,全中国大约有1亿人收到这条短信。但这样大规模的群发短信并未带来实际销售,据《藏地密码》出版方读者图书有限公司透露,截止目前,《藏地密码》在数字版权上的收入依然为零。

乱 弹

没想到,“被”这个被动语的领头羊,在当下生活语汇中变得如此时尚,而富于创意地与某些词汇搭上线,让这个“被”突然拓展了内涵功能,诡异、生动而色彩丰富起来。“被违规”“被观众”“被工作”“被购藏”——这些混搭的新词频频出现在现实报道里,准确勾画了当下社会规则一些紊乱的情状和民众啼笑皆非“被纠结”的心态。

某小区住户某日下班,突然发现自己的门楣贴上了“文明家庭”的标签,而且户户有份,没有任何评选,也无任何考察,更没有提前告知,该小区住户就这样糊里糊涂“被文明”了一把。后知晓,小区委员会要争创文明小区,需要文明家庭的数字指标,解释为这种“被文明”的做法,也含有激励、约束的动机,让住户们在文明小区、文明家庭的光环下,生活的道德品行得到梳理、规范。尽管“被文明”的愿望是好的,但无疑这样的行为让“文明家庭”的称号遭到了极大贬值,也是对“被文明”住户的精神绑架。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很多美好的字眼,一旦成了被动语,对“被”接受者,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论符合或违背其主观愿望,都已变为既成事实或热门谈资。

想去旅游吗?当然。这是众多百姓的心愿。某乡镇开发的山区景点开业时,当地群众按家庭人口数计算都分到了景区票,并领受了游览任务,凭此提升景区人气。对山景早已司空见惯的当地群众,遵照政府的号召,无奈在家门口“被旅游”了一回。某文化

遗产地急于借遗产资源开发文化产业,借给铺天盖地的节庆活动添个名目的老旧招数,来凑个热闹。无奈当地文化遗产离当下时尚距离太远,沾不上边,花钱费力弄出的展览,观者寥寥。不巧,上级领导赶来助兴捧场,为营造声势,当地一所学校三个班临时停课,赶赴展场,陪领导参观。很多学生并不知道自己执行的是“被观众”的任务。现实中,如上的“被”事例不胜枚举,很多已经习以为常,百姓的心态也多从愤怒、诧异、尴尬,趋向平和,甚至有的不失幽默地期望“被”一次。

其实,在文化领域,“被”是最值得珍惜的。如果缤纷的舞台演出,绝大部分能够真正“被欣赏”;出版大潮中,绝大部分图书能够真正“被阅读”;走出去的文化大军,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真正“被需要”——那么我们的文化市场才真正“被繁荣”了。

取消“免费午餐”之后

刘毅非 姚 湜

近日,国家版权局公布了《电影作品著作权集体管理使用费收取标准》。2011年1月1日起,国内网吧、长途客车等各类交通工具播放电影,将向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缴纳一定版权费。对此,多家网吧、长途客车经营者、学者以及普通百姓均说出了他们的看法。

播放电影成本成倍上涨

国家版权局日前就电影著作权集体管理使用费收取标准发布的公告,明确了网吧以及各类交通工具的电影使用费收取标准及转付办法。

按照收费标准,网吧每天的使用费用为:电脑总量×网吧每小时收取费用×7.5%。吉林省长春市的网吧每小时上网费多数是3元,按此计算,一个拥有50台电脑的中小型网吧,每年的电影版权费要4000多元。“现在我们用‘乐吧’这样的软件下载电影,不管多少台电脑,每年只要1000多元。如果按此标准收费,电脑越多的网吧越吃亏。”长春市隆礼路上一家大型网吧的负责人说。

相关利益主体反应各异

对于网吧、长途大巴等播放电影缴纳电影著作权使用费一事,不同的利益主体反应大不相同。其中,网吧业主和一些网友

反应最为强烈,多家网吧老板称,收取一定的使用费是应该的,但是这个收费标准过高。不少网友担心上涨的运营成本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长春市市民赵威说:“网吧看电影要是收费,以后就没有‘免费午餐’了。”吉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付诚认为,该标准的出台是保护知识产权的举措。“免费午餐”的结束体现了社会对作者的尊重,同时也调动了他们创作的积极性,从长远来说,受益的还是百姓。

“使用费”不应一收了之

“如果缴纳版权费之后,除了不被起诉,没有任何利益,那‘使用费’不就成了‘保护费’么?”不少网吧经营者有类似的疑问。

付诚说,这个收费标准的出台可以看作是对传统经销模式的纠正,但是在纠正过程中,要注意三点。首先是获利如何分配的问题,收取的费用交给国家相关部门还是交给文化产品的作者,这一点要研究清楚,并且向公众公开;其次,要注意收费范围,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最后,应该分析被收费的单位是不是真正利用文化产品获利了,比如长途客车上播放电影,这能不能让运输部门获得利润,获了多少利?这些最好都要研究清楚区别对待。

作家富豪榜前10位数字版权收入之和不到20万元

数字出版动了作家们的“奶酪”

谢正宜 宋 浩

“可能又丢了一栋别墅”

对于数字版权收入问题,第一个回应的是畅销书作家慕容雪村,他说:“迄今为止,我签过4份数字版权的合同,未能从数字版权运营商那里收到一分钱。”当被问到是否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时,慕容雪村明显缺乏信心:“合约根本无法约束,运营商基本都是骗子,没签合同的盗版就更多了。诉讼成本太高了,打不起官司。所以想要从数字版权上拿钱最好是买断,能要一点钱最好,要不来也没什么办法。我的建议是,如果对方不肯预付款,这种合同不如不签。”

“我不知道啥叫数字版权,不是在一些格式合同中我就已经授权给出版社了?不知道!反正我还没拿到数字版权的一分钱。”知名学者易中天近日在北大数字版权研究基地论坛上的一席话,让在座的研讨数字出版产业的各方都有些尴

尬。有业内人士问他:“按照畅销书常规理论,基于数字版权所延伸的收入至少应该能占到传统发行的一半,按这个标准计算,你损失多少钱?”易中天笑答:“可能又丢了一栋别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网络管理者称,现在部分网站是靠“免费下载”电子书来赚取点击率,然后再以此和广告商谈判,收取高额的广告费。

数字出版时代短期难到来

如何追回自己应得的数字版权呢?靠作家自己的力量显然难以实现。“告不过来,索性不告”成为一些被侵权作家的无奈选择,却也助长了“数字盗版”的泛滥。

上海VICI传媒董事总经理赵若虹表示,对于一些畅销书作家来说,数字版权的收入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作家富豪榜上前10位的作家,全部图书的数字版权收入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万元。目前

数字出版的情况,有些类似当年纸质出版瞒印盗印图书的情形,作者不知道自己书在数字版权方面到底销售了多少,也不知道自己的数字版权到底该卖多少钱,很多作者宁可把数字版权拿在手里,他们不清楚合同里究竟有多少漏洞和陷阱,也不知道签完的合同是否真的有效。”

此外,对于“数字出版时代”这种说法,读者图书认为更像是“狼来了”的骗局,数字出版时代短期内很难到来,盗版对数字出版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各出版商都在忙着尝试数字出版,但实际上都没有赚到什么钱,传统的实体出版依然是图书公司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为此,已有业内人士开始质疑数字版权方面的巨额付出到底花在了哪里,同时,弄清数字版权的来源与去向,防止其层层流失,从而保护作家在数字出版上的应得利益,将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名语辑录

“目前的现状是:做电视的人中识字的也不多。首先要多识字、多读书;尊重历史、尊重自然、尊重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纪录片与故事片都需要真诚,纪录片还需要理智和客观,这是专业纪录片制作者必须有的素质,而观众也是下意识地以此来验收一部纪录片的成败。”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及其团队历时8年制作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近日在某视频网站上完成首轮播出,在网友中引起强烈反响。但在提及国内纪录片市场发展时,崔永元感慨“国内纪录片市场短期内难有起色”。他表示纪录片的发展和成熟市场的形成有赖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几十年当中上海博物馆之所以能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世界知名艺术博物馆,一是靠政府大力支持,二是博物馆同仁发奋努力,三是有这么一批关心和帮助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家朋友,他们在上海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博物馆做好了,收藏家主动来为你服务或者说向你做贡献,这就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博物馆把收藏家看做是自己的人,收藏家也把博物馆看成他们的朋友,双方赤诚相待,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保持了长久的友谊。”

——在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看来,上海博物馆初创时期收藏家对上海博物馆提供了很多帮助;在上海博物馆60年发展时期和关键的建设时期,众多的收藏家又对上海博物馆鼎力相助。长期以来,上海博物馆和这些收藏家以及他们的后代保持了长久的友谊。

“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使人们的幸福感受到相应的提升,相反,很多人感到空虚和茫然。传统文化的缺失和精神信仰的贫乏是很多人感觉不到幸福的原因,要寻找幸福就必须重建传统文化。而当前,我们寻找幸福的途径就是要把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价值融进我们的信仰世界,提升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财富兑换成幸福,从而超越财富,获得一份深厚、悠远的幸福感。”

——知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在某次讲座中谈到财富和幸福的关系时指出,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物质财富只有兑换成幸福才能体现其价值,而深厚、悠远的幸福感需要在传统文化中去寻找。

“现在的文学一共分为三股力量:网络文学、影视文学、传统文学。网络文学是现在文坛最重要的一股力量,网上发表的作品和出版的作品量都很大,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所有作品总和。近几年网络文学发展迅猛,但也存在一定的泡沫,掺水的太多,水平有所下降。网络文学经过沉淀以后,一部分会成为真正的文学,另一部分便成为泡沫。”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蒋子龙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谈了对网络文学发展的看法。同时在回答最欣赏的现代年轻作家的提问时,他表示“比较欣赏韩寒,他是现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个了不起的成果,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现在的‘80后’作家,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成为中国文坛的主力。”

李 琤 整理